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沉钟书系

吹芦笛 的诗人

—— 胡 风 ——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唐文一 编选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沉钟书系

吹芦笛 的诗人

—— 胡 风 ——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风代表作:吹芦笛的诗人/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沉钟书系)

ISBN 7-5080-1783-8

I. 胡… II. 中…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6267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1/32 开本 12.75 印张 301 千字 4 插页

1999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5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定价:1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编委会

主 编 舒 乙

副 主 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

执行编委 于润琦 么志龙 徐金廷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

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

吴福辉 李 今 周 明 林建初

钱理群 徐金廷 舒 乙 樊 骏



胡 风

同者

多少年过去了

我小时候在老家和伙伴们玩过许多

我的眼睛在老家时和伙伴们玩过许多

我的耳朵在老家时和伙伴们玩过许多

我的心在老家时和伙伴们玩过许多

多少年过去了

我长大了不眠日夜

我长大了不眠日夜

我长大了不眠日夜

我长大了不眠日夜

我长大了不眠日夜

胡风手迹



胡风作品书影

目 录

文艺理论

林语堂论	3
张天翼论	24
翻译工作与《译文》	53
现实主义的一“修正”	69
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	81
略论文学无门	84
吹芦笛的诗人	89
民族革命战争与文艺	96
文学上的五四	108
论民族形式问题	111
关于“诗的形象化”	177

人生·文艺·文艺批评	185
天才	192
青春的诗	193
论现实主义的路	199

诗 歌

儿时的湖山	289
赠 S	291
我从田间来	294
给死者	296
风沙中	298
旅途	300
给——	302
闷	304
心儿病了	306
虽然不是爱人	308
献给大哥	310
野火	313
冬之三部曲	315
寒夜	318
废墟上的春天	320
幻灭之歌	321
夕阳之歌	326
武藏野之歌	328
为祖国而歌	330

血誓 333

海路历程 337

杂 文

作家与草莓 349

战争与和平 351

辩证法与江湖诀 353

《过去的幽灵》 355

葛理斯·法朗士·时代 357

流氓哲学 359

存文 362

把目光放到“战壕”以外 365

冬夜通信 368

由“人性”到“互利” 373

写在昏倦里 376

断章 381

棘源村断想 384

棘源村断想(其二) 390

致反法西斯的敬礼 393

胡风小传 395

胡风主要著作书目 397

文艺理论

林语堂论

——对于他的发展的一个眺望

一个视角

忘记是什么时候了,大概是一年以前罢,我偶然看到了一本《论语》。那里面有一封仰卧在草地上架起脚来读《论语》的大学生寄来的信,写着他对于《论语》的意见。编者对于他的回答是,来信所陈,无一是处,唯读《论语》之姿势可取(大意)。这个回答是非常“幽默”的,从这里可以依稀地想象到这个刊物所要得到的是怎样的读者。然而,像这一类的资料在《论语》里面一定不少罢,《论语文选》的正文前面就有题为《反对论语者之溃灭》的由六幅合成的连环图画:

一、一桌麻将牌“三人差一”,所差的一位正坐在旁边的沙发上哈哈大笑地读着《论语》;

二、三人之一的西装青年起身去看了;

三、摩登女子也起身去看了,只剩下戴瓜皮小帽的胖子抱头着急;

四、胖子站起来走拢去;

五、胖子也站在那后面看;

六、一同哈哈大笑。

但实际上《论语》的反对者并不是完全“溃灭”了的。除了那些

打通电的“文学家”们以外，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极端的例子来。不久以前，在一个比较开明的报纸上登载了一篇涉及《论语》及其“姊妹刊物”《人间世》的文章：作者提到有一个叫做山内地方的住民，因为隔水太远，只吃得到咸鱼，由这就养成了爱吃咸鱼肚的习惯；鱼肚是最臭的东西，但那地方的人却觉得愈臭的鱼肚就愈好，《论语》、《人间世》的读者，不过是爱吃咸鱼肚的山内人罢了。

当然，这都是极端的例子，但《论语》及其姊妹刊物《人间世》广泛地走进了读者社会，同时也引起了各种不同的批判，却是事实。而这些批判又常常是集中在这两个刊物的创办者兼主编者林语堂氏的身上。为什么成了这样的呢？这是因为这两个刊物的存在与成长和林氏在学术界的经历与地位有不可分的关系的缘故；这是因为《论语》的“幽默”和《人间世》的“小品文”都是在林氏的独特的解释之下被提倡被随和了的，都是沿着林氏的解释而发展了的缘故。

所以，当我们研究林语堂氏的业绩的时候，是不能不牵涉到《论语》和《人间世》的影响的评价的。因为我们在这里所要究明的主题(theme)并不是他在言语学上音韵学上的成就，在那里面也许找得出来他对于中国学术的有用的贡献，也不是他在外国语文教学方面所树立的功绩，而是想说明，作为一个进步的文化人，他的“处世”态度的变迁表现了什么意义，他的文化批评和文学见解，客观上应该得到怎样的评价。

……其景况适为风雨之夕，好友几人，密室闲谈，全无道学气味，而所谈未尝不涉及天地间至理，全带油腔滑调，然亦未尝不嬉笑怒骂，而斤斤以陶情笑谑为戒也。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是吾辈纵谈之范围与态度也。吾集天下纵谈之友于一室，半月一次，使天下窃闻

我之纵谈，是办《论语》之意义也。（《与陶亢德书》，《我的话》四二页）

他的黄金时代

在这里，让我们和林氏一起回忆一下他的“浮躁凌厉”的时代罢。

一九二八年出版的《剪拂集》多少是反映了林氏个人的那个时代的，在《序》里，他用了不胜今昔之感的笔调叙述了他的回忆：

……我惟感慨一些我既往的热烈及少不更事的勇气，显然与眼前的沉寂与由两年来所长进见识得来的冲淡的心境相反衬，益发看见我自己目前的麻木与顽梗。这自然有种种的原因。一是自己年龄的不是，只能怪时间与自己。一是环境使然，在这……天下确已太平之时，难免要使人感觉太平人的寂寞与悲哀。

在这太平的寂寞中，回想到两年前“革命政府”时代的北京，真使我们追忆往日青年勇气的壮毅及与政府演出惨剧的热闹。天安门前的大会，五光十色旗帜的飘扬，眉宇飞扬的男女学生面目，西长安街揭竿抛瓦的巷战，哈德门大街赤足冒雨的游行，这是何等悲壮！国务院前哗剥的枪声，东四牌楼沿途的血迹，各医院的奔走舁尸，北大第三院的追悼会，这是何等激昂！……在当日，却老老实实不知堕了多少青年的眼泪，激动多少青年的热血，使青年开过几次的追悼会，做过几对挽联，及拟过多少纪念碑的计划。

不用说，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的阶段。虽然是在一定的限度

下面,但无疑地林氏是站在那个阶段的大潮中间的。从这薄薄的一本《剪拂集》里面,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来描写当时的他的“战斗的”姿态。

第一是对于投身在北京政府下面的学者的斗争。当时的北京学术界,显然地分成了两大营垒,一部分凭借了现有的势力,一部分却和南方革命怒潮中的民主势力相呼应。林氏的态度主要地是被后面这个阵营的战略所决定的。

……现在的学者最要紧的是他们的面孔,倘是他们自三层楼滚到楼底下,翻起来时,头一样想到的是拿起手镜照一照看他的假胡须还在乎?金牙齿没掉乎?雪花膏未涂污乎?至于骨头折断与否,似在其次。

学者只知道尊严,因为要尊严,所以有时骨头不能不折断,而不自知,且自告人曰,我固完肤也,呜呼学者!呜呼所谓学者!

因为真理有时要与学者的脸孔冲突,不敢为真理而忘记其面孔者则终必为脸孔而忘记真理,于是乎学者之骨头折断矣。骨头既断,无以自立,于是“架子”,木脚,木腿来了。就是一副银腿银脚也要觉得讨厌,何况还是木头做的呢?

托尔斯泰曾经说过极好的话。论真理与上帝孰重,他说以上帝为重于真理者,继必以教会为重于上帝,其结果必以其特别教门为重于教会,而结果必以自身为重于特别教门。(《祝土匪》,《剪拂集》二——三页)

这种学者,“一方面讲革命,一方面正在与旧势力妥协”(《剪拂集》九六页),“今日为帝国主义作宣传者乃知识阶级自身之一部分人物,而且大多数是比较新派的人物,即所谓出过洋,念过洋文的

人”(同上,一二一页)。他把这些叫做“文妖”,要发动一个“打狗运动”,把他们“肃清一下”。

第二是主张欧化,反对国粹主义。投身于现成势力的学者们,在思想上当然是当时以《甲寅》为首的复古势力的支持者。林氏曾提出“足以针砭吾民族昏愤,卑怯,颓丧,傲惰之痼疽”的六个条件:

一、非中庸(即反对“永不生气”也)。

二、非乐天知命(即反对“让你吃主义”也)。

三、不让主义(此与上实同。中国人毛病在于什么都让,只要能够觉得忍不了,禁不住,不必讨求方法而方法自来。法兰西之革命未尝有何方法,直感觉忍不住,各人拿刀棍锄耙冲打出去而已,未尝厉兵秣马以为之也)。

四、不悲观。

五、不怕洋习气。求仙,学佛,静坐,扶乩,拜菩萨,拜孔丘之国粹当然非吾所应有,然磕头,打千,除眼镜,送讣闻,亦当在摒弃之列,最好还是大家穿中山式之洋服。

六、必谈政治。所谓政治者,非王五、赵六忽而喝白干忽而揪辫子之政治,乃真正政治也。新月社的同人发起此社时有一条规则,谓在社里什么都可来(剃头,洗浴,喝啤酒),只不许打牌与谈政治,此亦一怪现象也。

第三是所谓“性之改造”。对于有“少不更事的勇气”的林氏,当时阴沉的北方社会情势是不能够使他满足的。他把这原因归在中国人的“性癖”上面。

……中国人今日之病固在思想,而尤在性癖,革一人之思想比较尚容易,欲使一情性之人变为急性则殊不容易。中国今日何尝无思想,无主义,特此所谓主义,纸上